

中国史官文化 与《史记》

陈桐生 著



高山仰止

汕头大学出版社

中国史官文化 与《史记》

粤新登字 1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陈桐生著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 09

ISBN 7—81036—032—9

G·6

I. 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

II. 陈桐生

III. 史记—文化—中国

IV. GO

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揭阳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1993 年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82 千字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12.80 元

陈桐生 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序

霍松林

经过三个寒暑的勤奋钻研和深沉思考，陈桐生君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终于写成，在答辩会上得到一致赞许，如今即将出版了。桐生索序，我乐于谈谈这篇论文的几个特点，和读者交换意见。

桐生博览载籍，视野恢宏，思路开展。他不局限于就《史记》研究《史记》，而是把《史记》放在中华文化、特别是史官文化的背景中，纵横考察，探本穷源，逐渐形成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史记》以前，中国史官文化的发展可分为上古三代的天人文化、孔子《春秋》的王道文化哲学和战国史官文化三个阶段；司马迁正是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形成了以天人感应为特征的天道观、以德治为核心的王道观与及时建功立业的士道观，由此构成《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伟构思。桐生曾说：司马迁撰写《史记》，其目光洞察两千四百多年的历史；我们研究《史记》，其目光不应比司马迁短浅。他这种力求拓宽视野的努力是可取的，给论文带来的优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由于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史记》的文化背景，因而能够联系文化背景解释“《史记》学”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例如关于“八书”体制的来源，古今众说纷纭，作者从汉家“受命改制”的

文化背景考察，提出《史记》“八书”体制为司马迁首创。其首创的依据，是阴阳五行学派和春秋公羊学派应天受命改制的理论和汉家改制的实践。礼、乐、律、历、天官、封禅，都是改制的内容；《河渠书》与《平准书》，也与改制有密切联系。又如关于《史记》的思想归属问题，学术界或认为属于道家，或认为属于儒家，莫衷一是。作者则认为：从上古到秦汉之际，中华文化学术经历了“道术为天下裂”和“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过程。在融汇百家的大趋势下，《史记》以“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为宗旨，其学术思想，包容了王官学的六经和诸子百家之学。因此，将司马迁的思想归于儒道某一家是没有意义的。从整合百家的角度来看，《史记》体现的思想接近于《易传》。诸如此类，都是从考察文化背景和《史记》内涵中获得的新认识。

作者撰写此文，不依傍旧说，更不沿用旧说，而是从第一手资料出发，独立思考，得出结论。如对《史记》的天道观，学术界的主导意见是天道自然、天人相分；此文则引证上百条资料，力主司马迁天道观以天人感应为特征。学术界认为《史记》通变论中有发展进化观点，此文则以许多证据表明：《史记》的通变观与其天道观一脉相通，以终始循环为特征。作者指出：《史记》的进步性并不表现在天人宇宙观和历史观方面，而是表现在它的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平等观念方面。《史记》最完满地体现了一个伟大民族在结束动乱分裂、重新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那种特有的刚健笃实、自强不息的精神。类似的新见解，文中还有很多，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供参考或引起争论，把《史记》的研究引向深入。

桐生功底扎实，治学勤谨，对于中华文化的承传有高度的使命感。他愿以这篇博士学位论文为起点，纵横开拓，对《史记》作更深更广的研究，祝愿他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1993年初春写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

序

王 启 兴

在武汉大学中文系攻读古典文学硕士学位期间，桐生即在研读先秦有关典籍的同时，对先秦时期的历史、哲学、美学、文化、宗教等领域进行钻研，这既为他以后的科研打下坚实的基础，又扩大了视野，更培养了敏锐的观察力和缜密的思考能力。最后桐生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尤其是学位论文很有开拓精神，也颇多新意。八九年桐生考上著名古典文学史家霍松林先生的博士研究生，专攻先秦两汉文学，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重新深入研究，并确定为博士论文的论题。此后桐生于寒暑假返武汉探亲，都来相访，也免不了谈及《史记》的有关问题，以及他对研究《史记》的一些想法。九一年初，桐生把他的《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提纲寄给我，征求我的意见。当我认真地看完提纲后，异常兴奋，感到提纲角度新，思路清晰，对《史记》的研究是一重大的拓宽。当然，对一些章节，我也谈了自己的意见。论文完成打印好后，桐生又很快寄给我，所以，我是最早阅读这一论著的读者。

《史记》多年来是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热点，也不乏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著，但我认为桐生的《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有其显著特点。首先是角度新颖，高瞻远瞩。文化是影响个人和社会

的巨大力量，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巨人，总是优秀的民族文化所孕育的，司马迁及其《史记》正是先秦文化哺育的结果。桐生准确地把握住这一关键问题，从文化学的角度，以宏观的视野，把司马迁的巨著《史记》置于先秦及两汉初的特定文化环境中加以研究，尤其是史官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这样的研究不仅角度新，而且是深层的，因之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其次是多层次地剖析，深刻精到。桐生以敏锐的学术眼光，从不同的方面论证《史记》深邃内涵，这里既有纵向的考察其文化渊源，又有横向论述两汉盛世气象与司马迁的文化心理，还深入论析司马迁的天道观、王道观、士道观等问题，多有发明，多有创见，把《史记》研究大大向前推进。再次是驳辩有力，成一家之言。在学术研究中，见仁见智，对某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百家争鸣”，各抒己见，以推动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桐生在“谤书说”辨、《史记》思想近《易》说，以及司马迁与董仲舒思想异同考等章节中，经过周详的论证，提出异于时贤的看法，言之成理。虽然这些问题尚可进一步讨论，但桐生所论很有说服力，成一家之言。最后本书材料翔实，论据充分，读之无空疏之感，我以为这也是一大特点。

桐生正值盛年，基础扎实，思想活跃，眼光敏锐，加之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富于开拓的精神，相信他会继续从不同的方面研究《史记》，也相信他在巫文化与《楚辞》的研究中会有新的突破，取得可喜的成绩。我期待着。

1993年元月28日写于武昌珞珈山

内 容 提 要

中华民族文化特别是中国史官文化是孕育《史记》的沃壤。司马迁在上古史官天人文化、孔子《春秋》王道文化哲学和战国史官价值观的影响下，形成了他的天道观、王道观和士道观，构成了《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宏伟构思。

责任编辑 顾 乡

封面设计 祥 伍

目 录

霍松林 序

王启兴 序

1 引 论

3 第一章 中国史官的天官职能与天人理论

3 一 中国史官的天官职能

14 二 《周易》的天人宇宙观

18 三 阴阳五行学派的五德终始说

28 四 春秋公羊学的三统循环论

34 五 汉家改制中的理论热点

38 第二章 孔子《春秋》的王道文化哲学

38 一 对孔子作《春秋》的文化认同

47 二 孟子对《春秋》文化意义的阐发

49 三 王道文化传统的内涵

52 四 《春秋》三传释旨

60 五 孔子与六经

64 六 《史记》的文化定位

72 第三章 战国士文化与史官文化

72 一 战国士文化与史官文化的关系

75 二 战国士文化之源

77 三 战国士林的价值观

82 四 战国士林的文化心态

92 五 《易传》、《中庸》的超越哲学

95 第四章 司马迁的生命体验与文化心理

96 一 早期生命体验

99 二 沐浴战国士文化的流风余韵

105 三 司马迁的两个精神支撑点

108 四 司马迁与“自我实现者”的比较

110 五 血染的个性风采

114 六 司马迁受刑后的心理分析

121 七 司马迁的死亡之思

124 八 司马迁的文化复仇心理

132 九 《史记》的半官史半私史性质

136 第五章 司马迁的天道观

136 一 《史记》的神学目的论

146 二 《史记》的天人感应论

- 156 三 《史记》的历史循环论
- 162 四 《史记》“八书”的通变论
- 174 五 《史记》的经济循环论
- 176 六 《史记》的天命崇高论
- 185 七 《史记》天命观反例分析
- 189 八 《史记》“进化论”材料分析
- 192 九 《史记》求实精神的贯彻程度

200 第六章 司马迁的王道观

- 201 一 司马迁对历代帝王政治的评判
- 206 二 司马迁论汉武兴儒学
- 208 三 司马迁论汉武伐四夷
- 216 四 司马迁论汉武封禅
- 220 五 司马迁论汉武经济政策
- 225 六 司马迁论汉武吏治
- 229 七 政治与文化的分离
- 230 八 天道与王道的沟通渠道
- 231 九 天道观与王道观的矛盾及其统一

233 第七章 司马迁的士道观

- 234 一 《史记》中的变例分析
- 241 二 下层士林的丰碑
- 248 三 《史记》人物评价中的非道德化倾向
- 253 四 功名难遂的悲歌
- 258 五 对“烈丈夫”的礼赞

262	第八章 “谤书说”辨
263	一 司马迁从根本上拥护汉家政权
267	二 《史记》贬损汉家的两点依据
273	三 宫刑与《史记》的关系
282	四 “谤书说”的实质
284	第九章 《史记》思想近《易》说
284	一 秦汉之际的学术大趋势
287	二 《史记》与《易》学
289	三 《易传》与《史记》的宇宙观
293	四 《易传》与《史记》的通变论
298	五 《易传》与《史记》的尚德思想
302	六 《易传》与《史记》的人生观
305	第十章 司马迁与董仲舒异同考
305	一 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说不能成立
316	二 司马迁与董仲舒相同之点
328	三 司马迁与董仲舒相异之点
332	四 几点结论
333	第十一章 《史记》对中国史官文化的贡献
333	一 《史记》对中国史官文化的总结
337	二 《史记》的精髓
342	后 记
349	主要阅读书目

引 论

史官文化的概念最初是由范文澜先生提出来的。范先生在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人关于学分南北的观点影响之下，分别以史和巫概括南北文化的特征。他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黄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史，苗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巫。黄炎族与一部分苗黎族混合成华族，巫史两种文化并存，互相影响也互相斗争。”又说：“史重人事，长于征实；巫事鬼神，富于想象。……《楚辞》是巫官文化的最高表现。其特点在于想象力非常丰富，为史官文化的《诗》三百篇所不能及。战国时期北方史官文化、南方巫官文化都达到成熟期。”^①可见范先生所说的史官文化实际上就是指北方文化，这可以说是一种泛史官文化观。这种泛史官文化以崇尚实际，重视人事为其基本特征。上古三代时期史官在北方职掌文化，这是事实，但只要我们仔细推敲，就发现以史官文化来指代北方文化并非完全妥当。早期社会巫风盛行，殷商时期即是一个巫风弥漫的时代。巫史最初颇不易分，而分离出来的史官主要是履行天文历法、祭祀占卜、祥瑞灾异等天官职能，仍带有浓厚的巫术色彩，至于论载倒在其次。

本书所说的史官文化则纯粹是一种狭义概念，它是在下列两层意义上严格使用的：一是指从上古三代到秦汉时期以史官阶层为主体创造出来的文化；二是指借助于史学阐发的思想文化观念。它是以创造主体与学科为区分标准，并不含有与南方巫官文化相对的意义，也不纯粹是以崇尚实际重视人事为特征。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本书认为，这种史官文化是直接孕育司马迁巨著《史记》的文化土壤。

从上古三代时期到秦汉之际，中华民族文化经历了从统一到分化、再从分化到整合这一过程。中国史官以其职业智慧自始至终参与了民族文化的创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影响深远的中国史官文化。在上古三代时期，史官因掌管天文术数而成为中国文化学术之宗；在春秋末年王道衰微之际，孔子从史学角度作《春秋》明王道，从而使王道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哲学；战国史官参与了战国士文化的创造，形成了一种新的士林价值观。中国史官文化以其独特的创造而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史记》延生于民族文化的整合阶段，它通过对此前史官文化传统的总结，参与了秦汉之际规模宏伟意义深远的民族文化整合工程。中国史官文化中的天人文化传统、孔子《春秋》的王道文化哲学和战国史官价值观也就极其深刻地影响到《史记》著述，由此司马迁形成了他的天道观、王道观与士道观，构成了《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宏伟构思，《史记》也因此成为司马迁那个时代的文化昆仑。

第一章 中国史官的天官职能与天人理论

中国史官的天人文化传统，大致有两条线索可寻：其一是经验的线索，即史官所履行的天文术数方面的天官职能；其二是理论的线索，又可分为《周易》的天人宇宙观和阴阳五行学派、春秋公羊学的宇宙论及其历史哲学这两个方面。在汉家受命改制的过程中，天人古今问题成为当时的理论热点。这些天人文化传统对司马迁天道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成为《史记》天道观的文化渊源。

一 中国史官的天官职能

“史”的本义是什么？对此古今语言学界的理解歧异甚大。《说文》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从古文字形上考证“史”象手执简形，非许慎所训中正之义，即是说“史”是执简记事的官员。江永《周礼疑义举要》以为“中”是“簿书”，与今人所说的案卷同义，这与吴氏所说的“中”象手执简形大致相同。章炳麟在《章氏丛书·文始》卷七中从字形、字音、字义三方面考释“中”为记事简册。王国维在《观堂集林·释史》中以为“中”是盛筭之器，而筭与简册本为一物，因为史之所执，因此盛筭之“中”，亦可用之盛简册。他的结论是“中”是盛筭之器，而“史”为持书之人。以上几家说法虽然还有一些差异，但都认为“史”的本义是手执简册记事的官员，在对“史”的释义上渐渐达成共识。这些说法可能都受到《汉书·艺文志》关于“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说法的影响。思想上有了先入之见，然后再多方设证。近年来，语言学者和考古学者多